

投融资方略

■ 刘慧勇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投融资方略

刘慧勇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傅国文

责任校对：张京文

责任印制：毛春明

投融资方略(Tourongzi Fanglüe)/刘慧勇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6

ISBN 978 - 7 - 5049 - 4357 - 6

I. 投… II. 刘… III. ①投资—研究—中国②融资—研究—中国
IV. F832. 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9551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72190, 66070804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 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 66070833, (010)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22. 75

字数 443 千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4357 - 6/F. 3917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序 言

改革开放，使我国坚实地踏上了通往和谐富强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行进速度快慢，取决于诸多因素。投融资方略正确与否，便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编入本书的文章，虽然写作与发表的时间跨度达 26 年（1981—2007 年），但都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投融资方略，体现同一种追求——更快走向和谐富强。这是本书选用封面标题的缘由。

除内容务必切题外，本书选择文章还坚持一条标准：要有较强的现实性，而不论写作时间早晚。譬如，发表于 1990 年的《论 80 年代我国经济与投资高速增长的政治意义》一文，对我国经济与投资增长“虚、热、胀”说的批驳，读起来好像是在当前我国投资形势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浅议转移支付对现阶段我国住宅商品实现的积极作用》发表于 1996 年，现在看来对于解决城市平民住房难问题，仍有参考价值。更早的《论适度投资率》和《关于适度积累率的几个问题》，虽然分别发表于 1983 年与 1981 年，但由于投资率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界正在讨论的热点，因而也不过时。

当然，早期文章的天生缺点是：资料已显陈旧；但作为弥补的是：观点正确与否，已经岁月检验。人云：路遥知马力；实践检验理论，时间辨别真伪。另外，早期与近期文章集在一起，还带来一种派生好处：给人历史感。新旧数据相对照，反映经济发展历程；不同年代研讨的内容，体现理论争论史。一些眼下的疑难问题，用历史眼光看，则是很清楚的。

为便于读者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入选各文，不依时间排序，而按观点分章。每章均以最突出的核心观点命题，并根据各文的具体内容，按照从整体到局部、由抽象到具体、从个别到一般、先理论后政策，或者反之的某种逻辑顺序，进行适当排列。因此，本书虽为论文集，但从编排形式和实际内容看，又有些接近专著。

全书总计 10 章，各章标题依次为：经济建设、能快则快，宁肯欠债也要加强基础建设，国债民财、公债非债，资金不应成为发展瓶颈，保持建设

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切勿僵化看待投资率，多方筹资助推城市化进程，投资与通胀并无必然联系，不宜为控货币而压缩投资，完善投融资法律法规。这些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关联，彼此依赖，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读者可能在一些文章中或详或略、或明或暗地同时看到其他各章中的内容，好像一文即可代表全书。反过来，从整体上看，全书又似乎仅为一篇长文。

此书对我个人来说，凝聚多年心血。希望她能够对我国投融资调控发挥一定参考作用的心愿，不言自明。在此，对中国金融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给予本书的出版机会和付出的辛勤劳动，致以由衷的谢意！

作 者

2007 年 2 月 25 日

目 录

第 1 章 经济建设 能快则快	1
1.1 能快则快	
——适用于整个发展中阶段的长期战略	1
1.2 积极投资 能快则快	
——我的投资观	4
1.3 论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经济与投资高速增长的政治意义	7
1.4 通缩是加快建设的好时机	13
第 2 章 宁肯欠债也要加强基础建设	16
2.1 论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基础产业投资融资战略	16
2.2 论公共工程投融资	19
2.3 略论加速西南水电开发的投融资政策	27
附：点“水”成金	
——《金融时报》记者述评	33
2.4 水利开发建设：跨世纪的课题	35
2.5 南水北调，西线并没有那么难	39
2.6 略论西线大调水的主要方向	40
2.7 小议黄河治理战略	41
2.8 我国铁路建设速度应当提高到年均一万公里	43
2.9 再论我国年建一万公里铁路的必要性	45
2.10 “以人为本”话磁浮	50
第 3 章 国债民财 公债非债	56
3.1 略论国债民财与公债非债	56
附：国债越多 百姓越富	
——《贵阳晚报》记者述评	66

3.2	西部开发 公债先行	67
3.3	用市政债券开通中小学校车	73
3.4	小康社会需要繁荣债券市场	76
3.5	应当把发行国债作为一项长期国策 ——2000 年我国国债市场综述	80
3.6	如何更好地协调我国当前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85
3.7	购销政府债券与商业银行经营战略调整	88
第 4 章	资金不应成为发展瓶颈	99
4.1	钱生事, 还是事生钱?	99
4.2	发展多层信用 动员国内储蓄 ——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必由之路	101
4.3	健全金融体系 加强基础建设	106
4.4	试论加快我国水电建设的资金主渠道	111
4.5	三峡一叶 莫障泰山 ——水电“国力论”	115
4.6	“短存长贷”与“短借长用”辨析	117
第 5 章	保持建设规模 优化投资结构	120
5.1	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研究	120
5.2	论年度投资规模增长规律 ——兼评“投资规模膨胀论”	132
5.3	略论确定建设规模的方法	143
5.4	再论投资规模	150
5.5	注重结构调整 防止“一刀切” ——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的看法和建议	158
5.6	调控电力投资 务必重在结构	165
第 6 章	切勿僵化看待投资率	167
6.1	论适度投资率	167
6.2	关于适度积累率的几个问题	170
6.3	略论国民收入增长率对积累率和投资率的制约关系	173
6.4	对我国投资率波动原因的实证分析	179
6.5	人均收入水平决定投资率的基本走向	185
6.6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决定投资率的大致水平	188

6.7 我国投资率国际水平剖析	191
6.8 我国货物投资比重还有上升空间	196
6.9 我国名义投资率将趋于下降	200
第7章 多方筹资助推城市化进程	204
7.1 略论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筹资战略与途径	204
7.2 让“钱路”畅通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方略	207
7.3 城镇化呼唤市政公司债	235
附：新世纪中国经济的最大增长点 ——《金融时报》编辑点评	241
7.4 城镇化呼唤市政建设债	242
附：促进全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行举措 ——《金融时报》编辑点评	248
7.5 城镇化呼唤地产信用	248
7.6 搭建筹资平台 加快城镇建设	253
7.7 城市负债与转让土地两种筹资途径的比较研究	256
7.8 浅议转移支付对现阶段我国住宅商品实现的积极作用	259
第8章 投资与通胀并无必然联系	262
8.1 投资、票子与物价	262
8.2 对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的实证分析	266
8.3 正确认识通货膨胀成因大胆加强基础建设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	272
8.4 加强基础产业建设 积极治理通货膨胀	273
8.5 增加短线产业投资 从供给角度抑制通货膨胀	278
8.6 抑制通货膨胀需要加大若干产业投资与信贷力度	279
8.7 切实稳定物价 需增公共工程	283
8.8 开发水电是稳定物价的战略性措施	288
第9章 不宜为控货币而压缩投资	290
9.1 正确认识货币信贷高增长	290
9.2 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规律研究	295
9.3 信用规模增长动力论	302
9.4 信用规模强扩张原理	308
9.5 信用规模强波动原理	315

9.6 价格体系改革与货币供应量调控	321
9.7 理顺分配关系 稳定货币供应	329
第10章 完善投融资法律法规	336
10.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完善公债立法	336
附：变革限制信用的法	
——《中国市场经济报》记者访谈	343
10.2 如何规定基础产业新建项目最低资本比率	345
10.3 调低项目最低资本率 加快西部水电开发	349
10.4 规定基础设施项目贷款风险系数	
——对《商业银行法》的一点修改意见	352

第1章 经济建设 能快则快

1.1 能快则快

——适用于整个发展中阶段的长期战略

评价我国的投资总量和投资增长速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具体地说，在由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整个阶段上，都可以引用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①

一、关于“能快则快”的战略思考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比较快，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目前仍然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很少，不加快发展，不仅人民得不到应有的实惠，整个国家都会遭受欺凌，社会制度也会受到诋毁。正是出于此种战略上的考虑，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则快。

能快则快，虽然只有4个字，但却很全面、很辩证。邓小平赞成快，是讲条件的，其中的必要条件，就是“能快”、能发展。在“能快”的前提下，越快越好。为什么这样讲呢，道理很简单。概括起来说，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一些，从国内看，能够使更多的穷人尽快摆脱贫困，尽量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从国际看，则有助于增强国家竞争力，提高国际声望。

凡事皆有两面性。但与上述好处相比，经济发展速度快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都属于小问题，可以在发展过程中设法解决。至于经济发达后，人均消费水平提高、资源消耗数量增大的问题，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不是一个民族（即使她在地球上的人口最多）通过自觉减缓自己的发展速度，就能够获得解决的。或许，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依赖科学技术的更快发展，譬如加速研发海水核能利用技术等。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5页，人民出版社，1993。

因此，古代哲学家墨子就曾经涉及的这个古老问题，不应当从根本上动摇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强调的“能快则快”的发展理论，应当适用于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整个历史阶段。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应当转而采取何种发展战略，需要在真诚而又充分听取欠发达国家与地区意见的基础上，与发达国家共同商讨，尽可能采取一致行动。在此之前谈减速，还为时尚早。

二、“能快则快”同样可用于评价投资增长速度

根据邓小平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国民经济发展应当“能快则快”，这是不是意味着其中的投资增长也要“能快则快”呢？国民经济是个有机的整体，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弄清楚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投资与消费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首先，应当充分肯定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究竟能够有多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增长速度。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发展“能快则快”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其中的投资增长要“能快则快”。离开了投资增长的“能快则快”，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能快则快”。

其次，需要明确认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同向联动关系。消费属于需求，投资从短期看形成需求，从长期看则形成供给。实践表明，投资与消费两者之间，并非此消彼涨的逆相关关系，而是同涨同落的同向联动关系。增加投资，必然拉动消费；扩大消费，必然刺激投资。反之，控制消费，必然抑制投资；抑制投资，必然减缓消费。因此，经济发展“能快则快”，既包含消费扩大“能快则快”，也包括投资增长“能快则快”。

综合上述两点，经济发展速度与投资增长速度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因而，“能快则快”不仅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的，其实同样适用于评价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长速度。

三、按人力物力财力衡量我国投资总量还可适度增大

应当看到，在我国目前的投资总量中，包含有一定数量不符合社会需求的重复建设与盲目建设。与此同时，在我国现有的投资总量之外，还有医院、校舍、公共厕所和铁路、地铁、环保工程等社会需要建设而没有投资的部分。分析我国年度投资总量偏大还是偏小，必须同时考虑上述应减与应增两个因素，只考虑其中一点，是不全面的。

由于长期欠账，我国在医院、校舍、铁路、地铁、环保工程与水电风电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公共工程与基础产业方面的投资需求，极其巨大。仅以铁

路建设为例，早在一百年前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10年建设20万里铁路”，即每年建设1万公里铁路的设想。根据美国1880—1890年间的实践经验（年均建设1.18万公里），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我国目前每年新建铁路仅1000多公里，可见差距很大。

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如果要尽快得到满足，分摊到每一年的投资额，必然远远大于每年实际发生的重复建设与盲目建设数量。两者相抵，应加大于应减，必然得出目前的投资总量明显偏小的结论。但账不能这样算，按照邓小平“能快则快”的思想，必须认真考虑客观可能，即充分考虑人力、物力、财力对投资的制约。

人所共知，目前我国就业不充分，很多方面产能过剩，社会资金大量闲置，外汇储备与日俱增。因此，从供给角度观察，按全社会可以动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衡量，现阶段我国的年度投资总量，即年度投资规模，还有适当增大的潜力。这部分可以增加的投资潜力，加上有可能压缩下来的不当投资，两者之和就等于可追加的必要投资。现有的投资总量减不当投资，加可追加必要投资，等于适度投资规模。按上述方法计算，这个数额比现有投资总量要略大一些。

四、解决投资结构问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与行政两种机制

一方面存在不当投资，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必要公共工程没有建设，这种现象无疑应当称为：投资结构不合理。我国的投资结构问题，不是近年新出现的，而是存在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要有效地解决投资结构问题，除了必须认对病症，把宏观调控的重点真正从控制投资总量转向调整投资结构外，在调控手段方面，则需要下对药，充分发挥市场与行政两种机制的结构调整功能。

（一）以市场机制为主、行政机制为辅，抑制和减少不当投资

按投资主体划分，不当投资主要来自民间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其中的盲目投资，主要来自民间；刻意追求政绩的不当投资，则出于地方政府。

对于来自民间的盲目投资，很难事前准确判定，必须通过市场进行最终检验，经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加以整治。不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企图在保温箱中培育百分之百成活的民营企业，以彻底避免投资浪费，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旧思维，效率很低，浪费更大。

对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不当投资，则必须主要依靠行政机制加以限制。建设一项公共工程，究竟是地方政府追求政绩，还是当地人民的心愿，不能只由当地的或者上级的官员说了算。在这个事情上，能够让大多数人接受的判定方法和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是完善公共投资决策的行政机制，给人民决定权，不经当地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不能随便上马地方公共投资项目。

从数额估计,来自民间的盲目投资,可能比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不当投资多。因此,抑制和减少不当投资,需要以市场机制为主、行政机制为辅。

(二) 加强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建设,需要以积极规划为指导,加大市场机制作用

我国的社会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建设滞后,首要原因是建设规划相对保守,经常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而社会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建设规划相对保守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规划制定部门受投资膨胀说的影响,经常低估我国的实际投资能力,不敢大有作为。其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丰富投资资源,未能充分地用于加强我国的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建设,反而给不当投资留下了广阔的操作空间,加剧了投资结构扭曲。

针对上述原因,要切实加强我国社会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建设,进一步改善投资结构,必须首先从规划环节入手,科学测算我国的国力和可以利用的建设资源,制定更为积极的建设发展规划。譬如,在铁路建设方面,就需要认真研究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慎重考虑是否应当把我国的年均铁路建设里程,大幅度提高到1万至1.5万公里。各大城市的地铁建设速度,也应当大幅度提高,优化城市交通结构。

至于社会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的建设资金筹集,则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目前我国社会资金的闲置数量很大,外汇储备也比较充裕,市场筹资有很大的空间。因此,只要政策允许,不加人为压抑,建设资金的筹集实际上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还在认识方面。譬如,加强社会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投资建设,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会不会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家负债,会不会带来官员腐败等类担忧,才是导致我国社会公共工程建设畏首畏尾的真正原因。

(原载《投资增长速度研究》,统计出版社,2007年第1版)

1.2 积极投资 能快则快 ——我的投资观

《中国投资与建设》月刊给我一个表述投资观的机会,我感到很兴奋。经过几天思考,决定用“积极投资、能快则快”八个字来表达我的投资观。尽管这八个字不很全面,但它确实集中反映了十多年来、十几本书、百余篇文章中我所论述的基本观点和基本主张。因而,我不避偏颇,把整个投资观归结为上述八个字。

我知道,上述八字,常常不合时宜,每每遭遇控制。但我始终坚信这是我国振兴的必由之路。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15年,是积极投资的15年,

是不断突破以旧体制、旧方法控制规模“笼子”的15年。从一定意义上说，假如不是年复一年地突破规模控制，我国的经济发展达不到今天的水平，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富裕程度不会有现在这样高。如果每年都把投资完完全全地控制在限定的规模“笼子”之内，一点儿都不突破，那么，我国的经济水平有可能比现在落后5~7年，跨入不到90年代。

什么是积极投资？我给积极投资赋予三重含义。其一是指突破不切实际的、偏小的规模控制的投资，其二是指不含重复与盲目建设的有效投资，其三是指有人力物力支持确实可以实现的投资。三者齐备，才是积极投资。积极投资能够加快国民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是凭借着积极投资，使国民经济在突破中发展，社会在发展中稳定，体制在稳定的局面下改革，改革又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投资来源。总之，积极投资是促进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因素，而不是相反。

直到现在，我国仍然需要增加积极投资。因为有很多人力、物力在闲置，有很多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能源交通项目需要上，这类项目不是盲目投资，而是迟早都必须建设的。以水电开发为例，我国大学毕业的水电工程技术人员的有效生命实际上需要打50%的折扣，他们干完一项工程通常需要再耐心地等上5至10年才能有新的工程上马。设计力量闲置更为严重，远远超过施工队伍的闲置率。与设计施工力量闲置相伴随的是能源短缺和江水空流，每天每日流向东海、南海和印度洋的都是煤，都是油。

是不是因为缺少物力才使人力闲置、能源空流呢？不是。明摆着大量闲置的技术力量和可以开发的能源，怎么会长期匮乏建设物资呢？我国水泥已大量出口，如果有需求，可在短时期内大量增加供应。

我国铁路和公路交通建设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力量闲置率可能比水电略低些，但也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按他们现在拥有的实力，可以把铁路修得更长些，路桥建得更多些。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国的建设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很多该干的事情不能干呢？说来说去，主要是因为两个字：缺钱。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缺钱什么事也干不成，钱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社会里的钱不再是贵金属，不再是自然物质，无需冶炼，也不必动手纺织，它只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债权债务关系，纯属信用行为。作为社会关系的信用，其多少余缺，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从信用关系的角度看，修桥筑路建设电站，能够形成经久耐用的固定资产，这类资产趋于升值，可以做到“资能抵债”。资能抵债，信用关系就有保证，债权就不会落空。对于债权不会落空，又有巨大社会效益的项目，应当给予信用支持，以便把闲置的人力与物力结合起来，活跃起来，生产出物质财富。

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国家一方面闲置着大量的建设能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很多急需建设的工程,那么,一定是在融通资金的信用环节出现了某种问题,一定是某个方面或者某几个方面的政策出了毛病。不然的话,为什么现实的生产力不能得到发挥,本来有能力走得快却又走不快呢?当前,我国的毛病就主要出在信用问题上。本该提供的信用不提供,使本可办成的事干不成。

积极投资,能快则快。这八个字用在当前就是希望多上一些电力和交通通讯项目以及大中城市市政工程项目,多建一点儿普通的民用住宅,适当多搞一点“菜篮子工程”和农林水利工程。为什么还可以多一些,因为当前我国的建设力量还有闲置,并没有充分地利用起来。

为了防止一哄而起,避免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死灰复燃,可以把近期追加投资的重点放到经济落后的西北和西南地区。那里经济现在还比较冷,但是有丰富的资源,特别是水电资源、煤炭资源和原材料矿产资源以及人力资源。譬如说,可在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乌江、大渡河、红水河及黄河上游适当加快阶梯电站的勘察设计与立项施工,可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适当加快修建公路与铁路。在通路通电的地方选择开矿。只要理顺价格,西部地区的这类项目也是有效益的。加速那里的开发,只会优化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并缩小地区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有助于社会安定,而不会造成“过热”。

积极投资,能快则快。在当前就是要适当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适当多发放一点儿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包括基本建设贷款和技术改造贷款。目前,我国流行着一种误解,以为控制住固定资产投资与贷款规模,就能够腾出资金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缓解企业的资金短缺。事实上,每压缩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就会增加3亿~4亿元流动资金贷款需求或者形成3亿~4亿元相互拖欠。这一点已被多次“清欠”过程中注入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三角债”的实践所证明。

与追加投资的产业与区域倾斜方向相配合,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应当重点放在西部地区和电力、交通、通讯等行业以及大中城市的“菜篮子工程”。增加了固定资产贷款后,流动资金贷款需求的压力就会减少,算总账,有助于稳定社会信用总规模。

积极投资,能快则快,不一定促使物价上涨,因为投资活动对物价的作用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增加“菜篮子工程”投资,显然有助于稳定菜价,同样地,增加电力投资,也会有助于稳定电价,进一步有助于稳定耗电多的铝价。哪一种商品因缺少投资而供不应求,哪种商品就必然涨价。当然,在投资过程中有可能因建筑材料短缺而拉动钢材、水泥等价格上涨。但从长期发展的眼光看,解决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价格上涨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要适当增加建材工业投资。

事实上,将在今后二三十年间持续促使我国物价上升的因素主要是分配的不透明和多渠道发钱发物。例如,北京目前的职工平均月收入远远低于广东、深圳。这种状况不能不刺激北京的中央单位设法提高职工的月收入,即使在今后5年内把月收入由目前的平均300元提高到1000元,恐怕也不能真正解决两地间收入与心理不平衡问题。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必然有物价的上升相配合。不然的话,储蓄率就必须上升到无法想像的高水平。所以,收入分配的失控决定了我国物价必然在相当长时期内持续上涨,无论这一期间投资多还是少。投资多,将来形成的供给多,物价上涨的幅度有可能相对地小一些。投资少,将来形成的供给能力小,物价上涨的幅度有可能相对地大一点。这就是投资规模大小对物价上涨程度最大可能的一种影响。

积极投资,能快则快,在当前的具体操作方法有二。其一是给担负政策性融资任务的国家开发银行再适当扩大一点发债规模和贷款规模,扩大贷款规模用于支持新的重点项目。如果给国家开发银行扩大发债规模在操作上有困难,可以考虑采取第二个办法。那就是与未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之前相比,中央银行核给建设银行的基本建设贷款规模可以适当压缩,但不要压缩得过多。具体地说,就是不要把开发银行的贷款规模百分之百地从建设银行的原贷款规模切除,不要因为给开发银行贷款规模600亿元就相应减少建设银行贷款额度600亿元。而应当给建设银行适当保留一部分贷款规模,要求该行利用自己吸收的存款或动用超额储备给效益好的电力、交通、通讯等行业的项目发放基本建设贷款。

我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一定能够加速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社会稳定,因而也有利于改革。

(原载《中国投资与建设》1994年第7期)

1.3 论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与投资高速增长的政治意义

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社会主义发展出现新情况的历史关头,实事求是地评价80年代我国经济与投资的高速增长,科学地、合乎逻辑地阐述其政治意义,有助于比较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优劣,坚定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一、纵比横比都是高速增长的年代

80年代,我国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递增8.9%,在我国历史上只有新中国刚刚诞生的50年代与之接近,其他任何10年都没有这么高的增长

速度。

80年代,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从全民所有制范围看,平均每年递增13.6%,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平均每年递增18.3%,仅低于50年代,高于其他各个时期。

如果说50年代的经济发展和投资建设使我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开始走向工业化,那么,80年代则是又一次跃进,使我国驶入经济起飞的轨道。毫无疑问,80年代将作为经济与投资高速增长的光辉时期,载入我国史册。

不仅纵向对比是高速增长的年代,与世界其他国家横向对比,我国80年代的经济增长也是高速度的。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在整个年代中持续10年以高于8%的年平均增长率递增的情况很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是50年代和60年代。自1973年石油危机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了,80年代虽然有所回升,但幅度很小。而在增长速度最快的50年代和60年代中,也只有日本在7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高于8%,西德在50年代曾接近8%,其他国家、其他时期都比8%相差甚远。这从下面的表1-1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来。

表1-1 西方主要国家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

年代 \ 国别	美国	英国	法国	西德	意大利	日本
50	3.9	2.7	4.3	7.9	5.4	7.3
60	4.2	3.1	5.7	4.9	5.8	11.7
70	3.1	2.4	4.1	3.1	3.2	5.3

资料来源:《Economic Statistics 1900—1983》。

统计数字充分表明,无论纵向对比还是横向比较,我国80年代都是经济与投资高速增长的年代。

二、看生活看建设都是实增长年代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建设的高速增长,举世瞩目。然而,我国国内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以“虚、热、胀”三字评价之。在这三个字中,最要害的是“虚”字。

那么,何者为实,何者为虚,究竟有无客观的评价标准呢?我认为,判断虚实的客观标准是有的,那就是人民的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更具体地说,现实利益就是近期内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长远利益就是通过投资与建设增加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特别是基础性设施增加的数量。

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80年代不仅远远超过70年代、60年代,实际上也